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SHI

中国当代文学史

3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

3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

(三)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3 印张 2 插页 311 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530

书号: 10173·717 定价: 2.64元

目 录

第三编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3)
导 言.....	(3)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和 对文艺事业的摧残.....	(8)
第二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文艺活动.....	(15)
第三节 围绕《创业》等电影的斗争.....	(20)
第四节 天安门诗歌运动.....	(25)
本章小结.....	(29)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艺批评.....	(31)
第一节 概述.....	(31)
第二节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文艺观点.....	(36)
第三章 本时期的文学创作.....	(41)
第一节 概述.....	(41)
第二节 《天安门诗抄》.....	(45)
第三节 其它文艺作品 (电影《创业》、《闪闪的红星》， 小说《第二次握手》等)	(52)

第四节 《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

等反动作品..... (64)

第四编 一九七七——一九八二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71)

导 言..... (71)

第一节 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文艺路线的

清算..... (75)

第二节 党的文艺政策的落实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的贯彻..... (80)

第三节 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 (87)

本章小结..... (94)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艺批评..... (98)

第一节 概述..... (98)

第二节 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 (105)

第三节 冯牧、阎纲的文艺批评论著..... (130)

第三章 本时期的诗歌创作..... (141)

第一节 概述..... (141)

第二节 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的诗词..... (146)

第三节 《周总理，您在哪里？》和《小草在歌唱》..... (156)

第四节 艾青的诗歌创作..... (162)

第五节 青年诗作者的诗..... (170)

第六节 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 (179)

第四章 本时期的戏剧电影文学创作..... (186)

第一节 概述..... (186)

第二节 话剧创作..... (192)

第三节 电影文学创作..... (201)

第五章 本时期的散文创作..... (211)

第一节	概述·····	(211)
第二节	孙犁的散文·····	(217)
第三节	徐迟的报告文学·····	(225)
第四节	刘宾雁、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231)
第五节	其他报告文学作家·····	(237)
第六节	其他散文作家·····	(243)
第七节	少数民族的散文创作·····	(249)
第六章	本时期的小说创作(一)·····	(256)
第一节	短篇小说概述·····	(256)
第二节	蒋子龙的小说创作·····	(267)
第三节	王蒙的小说创作·····	(275)
第四节	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283)
第五节	刘心武、张弦的小说创作·····	(291)
第六节	张洁、宗璞的小说创作·····	(299)
第七节	《西线无战事》等优秀短篇小说·····	(309)
第七章	本时期的小说创作(二)·····	(318)
第一节	中篇小说概述·····	(318)
第二节	谌容的中篇小说创作·····	(326)
第三节	从维熙、邓友梅的中篇小说创作·····	(334)
第四节	刘绍棠、冯骥才的中篇小说创作·····	(342)
第五节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中篇小说·····	(351)
第八章	本时期的小说创作(三)·····	(357)
第一节	长篇小说概述·····	(357)
第二节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和《芙蓉镇》·····	(365)
第三节	《将军吟》和《冬天里的春天》·····	(372)
第四节	《东方》和《黄河东流去》(上部)·····	(377)
第五节	姚雪垠及其《李自成》·····	(386)

第六节 其他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398)

第七节 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 (404)

后记····· (411)

第 三 编

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导 言

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前一时期，由于党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方面未能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

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全面发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先后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同时把中央领导同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定成所谓“反党集团”，把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诬为“刘、邓司令部”，对他们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所谓“中央文革小组”，让它掌握和行使党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以“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狂热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一批野心家、阴谋家受到毛泽东同志重用，他们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并以它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掀起所谓“全面夺权”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风暴”。二月前后，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批判。从中央到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普遍受到冲击，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揪斗。同年六月，江青、康生又煽起所谓“文攻武卫”、“抓叛徒”的妖风，使得全国各地派仗四起，生产停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

在这一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被派往各单位“三支两军”。这一措施，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所谓支左，实际上是支派，不能不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是一次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的大会，它使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得到加强。

“九大”以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尽管它被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粉碎；但它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同志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同志为防止“文化大革命”错误继续发展，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正确地提出了要批极左思潮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党心民心的反映，也是一九六七年二月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的继续。但是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是反对“极右”，这不仅使周恩来同志的正确意见得不到贯彻，而且为“四人帮”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批林彪的所谓极右，对周恩来同志进行一连串的迫害活动。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召开。这次大会不但继续了“九大”的路线，还使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王洪文还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这就加剧了“十大”以后的政治斗争。

一九七四年初，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借此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这一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在毛泽东同志

支持下，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为了恢复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把生产搞上去，扭转恶化了的经济形势，连续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进行富有成效的整顿，因而使形势迅速得到好转。但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全国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的逝世，无限悲痛；对迫害周总理而犯下滔天罪行的“四人帮”，无比仇恨。四月，亿万群众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和全国范围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要求给“四人帮”治罪，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一伙急不可待，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十月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遂告结束。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打击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包括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既脱离了党的组织，也脱离了广大群众”，“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决定》还指出：“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

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在这场内乱中，尽管由于全党和广大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这场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领域里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文艺战线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突破口，受灾就更为严重。林彪江青一伙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挥舞着“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屠刀，疯狂地批判和践踏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批斗和迫害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又不断挑起事端，打倒一切，推行反党夺权的阴谋文艺，致使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一片荒芜。当然，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没有并且不可能完全打断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他们通过公开或隐蔽曲折的方式坚持斗争。”^①许多老作家或被投进监狱，或被关进“牛棚”，却毫不消极，仍然以炽热的激情，潜心构思自己的作品，默默地进行写作。一批青年专业或业余作者，仍然热爱文艺事业，利用被下放到群众之中的条件，刻苦地搜集生活素材，埋头创作。更有众多的党的优秀儿女，敢于坚持真理，破除现代迷信，不畏强暴，至死不

^①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

屈，以诗歌和文艺论文为武器，同“四人帮”展开殊死斗争。本时期文艺运动的实践说明，我们党用心血培育成长的社会主义文艺队伍，是一支压不垮、摧不毁的革命的队伍。“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①

第一节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的出笼和对文艺事业的摧残

六十年代初期，江青和林彪、康生以及张春桥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利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怀着篡党夺权的野心，插手文艺。一九六二年，康生制造了诬陷长篇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的冤案。此后，他们又利用毛泽东同志的两个错误的批示，开始对一批革命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进行批判斗争。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又制造了诬陷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冤案，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沉重打击。他们这种扼杀革命文艺事业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党和人民的怀疑和在一定程度上的抵制。于是他们为了排除障碍，寻找“全盘的系统的”占领阵地的所谓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江青和林彪开始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勾结，炮制了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一月，江青窜到苏州，找林彪、叶群密谋策划。江青先同林彪专门就“文艺问题”进行了一次密谈，次日林彪传话给总政治部：江青要召集部队数人开个会，部队要对江青的意见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何人参加，由总政报告，江青批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指令，派人到上海参加会议。二月二日到二十日，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上，

^①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江青系统地抛出了她蓄谋已久的反动观点，并据此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由江青、张春桥和陈伯达整理成文。

《纪要》全文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中第二部分为重点，讲了十个问题。贯串在这些问题中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民主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想。

《纪要》炮制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它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为依据，夸大我国文艺战线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混淆黑白，颠倒敌我，胡说：“文艺界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把建国以后文艺界提出的一些或有理论意义，或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观点，如“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的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以及所谓的“反火药味论”和“离经叛道论”，诬称为“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即所谓的“黑八论”。《纪要》还断言：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不是“中间状态的作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党领导的建国以后的文艺战线描绘得一团漆黑，全面抹杀了十七年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纪要》抛出了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文艺路线。它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与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等同起来，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绝对化，提出了所谓的“根本任务论”，以便在所谓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号下，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它排斥和敌视文艺的独创性和多样化，完全抛弃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所谓搞文艺“样板”，要求以主观唯心主

义的臆造代替现实主义和文学对真实生活的反映。把历史地真实地描写生活、塑造人物所必须遵循的规律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它要求把文艺批评变成消灭敌人的“匕首和手榴弹”，对所谓的“坏作品”和“错误论点”“进行原则性的批评”，“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以摧残被他们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实际上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文艺。它全盘否定我们党所领导的、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诬蔑指导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声称“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它全盘否定中外古典文学遗产，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的旗下，践踏和摧残中外古典文学遗产，包括十月革命后比较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推行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空白论”，以达到他们在文化领域里打倒一切，实现所谓的“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的罪恶企图。

《纪要》把我们党培养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诬蔑为“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就是“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前进中掉了队”。《纪要》打着“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旗号，企图把为我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包括在创作上和理论上取得重大成就的文艺骨干在内的文艺队伍打倒砸烂。

《纪要》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反革命纲领，是林彪、“四人帮”疯狂摧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毁灭文化的铁的罪证。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国贯彻执行。四月十八日，林彪、江青一伙控制的《解放军报》发表了